



[英] 汤姆·霍兰 (Tom Holland) / 著 于润生 / 译

波斯战火

PERSIAN FI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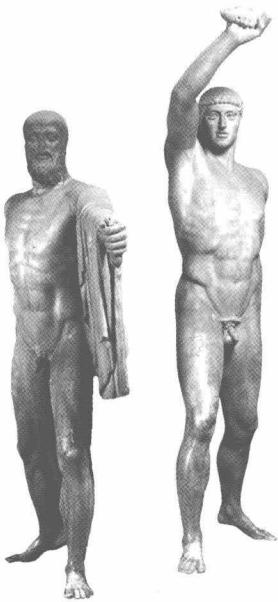
第一个世界帝国及其西征

THE FIRST WORLD EMPIRE
AND THE
BATTLE FOR THE WEST



西方学界盛赞此书为
“华美的史学巨著”
2500 年前的世界战争
成为历史的拐点





[英] 汤姆·霍兰 (Tom Holland) / 著 于润生 / 译

波斯战火

PERSIAN FIRE

第一个世界帝国及其西征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波斯战火：第一个世界帝国及其西征/(英) 霍兰著；于润生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12

ISBN 978 - 7 - 80225 - 814 - 3

I. 波… II. ①霍…②于… III. ①波斯帝国－战争史 IV. ①E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6036 号

Persian Fire: The First World Empire and the Battle for the West

by Tom Holland

Copyright © 2006 Tom Holland

Copyright licensed by Conville & Walsh Limited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波斯战火：第一个世界帝国及其西征

[英] 汤姆·霍兰/著 于润生/译

责任编辑：吕 林

装帧设计：王 桦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 - 65270477

传 真：010 - 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 - 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960 × 1300 1/32

印 张：11.625

字 数：316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2 月第一版 200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25 - 814 - 3

定 价：38.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波斯历史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罗伯特·麦克拉姆,《观察家》年度图书榜

用“精彩”来形容这部作品显然非常公正而合理……

——博伊德·汤金,《独立报》年度图书榜

精彩之极,此书众多引人入胜之处之一在于作者确实费尽心思深入到了波斯人的内心世界。

——保罗·卡特利奇,《独立报》

将那些此刻牢固占据我们头脑中的各种有关东西方关系的学术材料用这样一种现代的文体来写作,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托尼·鲁宾逊,《世界报》

……书中所描写的戏剧性时刻(作者描绘马拉松战场上雅典人冲锋场面的视角如同从希腊重装步兵铠甲内看去一样)将令读者战栗。

——《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历史图书榜

汤姆·霍兰以全景式的角度,写作了这本书,对古代历史事件进行了清晰地探讨……他为我打开了通向古代世界的大门,我感到非常开心。

——《观察家》

作者以丰富的反讽意味和令人难以抗拒的叙述时间感讲述了 一段勇敢而血腥的流行历史……此处对于温泉关战役的描绘是所有作品中最为激动人心的。

——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每日电讯》

真是一篇对波希战争以及弱小的希腊击退薛西斯及其舰队过程的详尽描述——这不是为了对胜利者的歌颂也不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而是一个出色的文学家为广大读者而写作的。

——维克托·戴维斯·汉森，《国家评论》(美国)

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都是发生在两千年前的事件，但是汤姆·霍兰让人觉得仿佛亲身经历了这些一样。在他令人惊讶的直接笔法中，即使我们已经知道战争的胜负，仍然还是会为之提心吊胆兴致盎然。

——阿尔蒂米斯·库珀，《旗帜晚报》年度图书榜

精彩……霍兰是一位头脑冷静的历史学家，他在这部关于古典希腊的书中展现出来的权威性和动人之处，毫不逊色于他的上一部叙述古罗马的历史著作《卢比肯河》。而他处理希腊和波斯文化宝藏所使用的手法也非常独到。

——玛丽·比尔德，《星期日泰晤士报》

当一个世界性的超级大国认定要在全球的各个角落推行它的模式时，霍兰考虑到了每一个要关注这种势力初露端倪之目的理由。当我们以推进民主为由兴高采烈地发动战争的时候，他也清晰地提出了民主已产生于战争之中的观点。

——彼得·斯托瑟德，《泰晤士报》

精妙动人……在他的前言中，汤姆·霍兰表达了一种愿望：“试图在学院和普通读者两个世界之间建立桥梁，但是不会像波斯王薛西斯修建从亚洲通向欧洲长达两英里的浮桥的行为那样浮夸且虎头蛇尾”。相反，他已经用比任何一个站在丹陛之上的“万王之王”更强的力量和气势占领了这片新土地。

——《独立报周日版》

前　　言

2001年的夏天,我的一位朋友被任命为一所学校的历史系主任。在九月新学期开始之前他作出的一系列决定中有一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的记忆中,这所学校的学生在毕业学年到来之前都被要求作一篇研究希特勒崛起的专题论文。而此时,在我的朋友提议之下,开始进行一些改革。他向同事们建议,应当把希特勒替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题目:十字军。这一激进的提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的同事们希望解释研究这样一个年代久远且与今天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无关紧要的题目究竟有何意义。我的朋友反驳道,历史系学生应该从研究一个与二十世纪的各个独裁者完全无关的题目中获得收益,因为义愤填膺的情绪只能让人激动。其他的教师认为极权主义是一个鲜活的选题,而十字军从来不可能是这种情况。这些问题如何能与对伊斯兰或基督教世界的仇恨,对东方或西方的仇恨联系起来呢?

仅仅过了几个星期,问题就有了答案,当年9月11日,19个劫机者心怀某种中世纪的怨气,将自己和数以千计的无辜者化为了灰烬。至少在奥萨马·本·拉登的眼中,十字军从来没有结束过。“你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96年他就警告穆斯林世界:“伊斯兰人民一直遭受着侵略的痛苦,这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十字军同盟强加给他们的不公与无道。”¹本·拉登擅于利用现代世界航空业和大众传媒进行威胁活动,但他一直以中世纪的视角诠释当下的潮流。在他的宣言中,过去和现在的时代仿佛融合在一起:用令人胆寒的罪行来恐吓美国或以色列的做法混同于重新建立西班牙的穆斯林统治或中世纪的哈里发国家的要求。因此不难理解,当

布什总统的顾问们要求他不要再次使用引人生恨的字眼时,他还是冷不防地在阐述战争政策时轻率地将恐怖主义描述为“十字军”。

当然,美国总统可能比沙特狂人更不了解中世纪历史的种种细微之处,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但是9·11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中,很多人都和布什总统一样绞尽脑汁想要回答一个同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各个报纸上连篇累牍充满了学者们对穆斯林仇恨西方作出的种种解释,有人追溯美国近年来朝令夕改的对外政策,有人考察欧洲殖民列强瓜分中东的历史,也有人追寻着本·拉登的分析回到了十字军自身这个起始点。极具讽刺意味的一种观点认为,这样一个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首例重大危机可能产生于某种让人疑惑不解的古代仇恨。有某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可能导致历史的终结,反过来,它似乎还将某些令人生厌的幽灵从远古的先人坟墓中唤醒。数十年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借助被描绘为对立面的共产主义——东方世界来自我定义;现如今,又回到俄国革命之前的陈旧习惯,将东方描绘成伊斯兰的天下。伊拉克战争、反移民势力的兴起(尤其是反对穆斯林势力)遍布欧洲,以及对是否可以允许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讨论,这所有的一切同9·11事件结合在一起,酝酿了一种令人不快的意识:在基督教的西方和伊斯兰教的东方之间存在着一条善恶的鸿沟。

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和哈佛的学者们都经常讨论一个话题,这个话题至今仍然充满争论:在新的世纪中不同文明之间注定要发生冲突。然而,至少现在欧洲与穆斯林世界正在被迫检讨不同文明之间得以区别的身份之基础所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爱德华·吉本认为:“东西有别的武断看法在全球范围中都根深蒂固。”²事实也正如此,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这种看法是历史上最容易长久存在的假设。这种假设远比十字军的历史要早,甚至早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历史,其久远的谱系几乎可以向前追溯两千五百年。历史的诞生就是伴随着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来的:“你们为何恨我们?”——因为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东西方发生冲突时,世界上第一位历史学家正是带着这个问题开始了他创作一生的著作主题。

他的名字叫做希罗多德(Herodotus)。身为一名希腊人，他诞生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旅游胜地博德鲁姆，当时那里被称为哈利卡纳苏斯，并成长于亚洲最为边缘的地带。他非常想知道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人们为何难以和平相处。表面看来，道理非常简单。据希罗多德记载，亚洲人将欧洲视为不可理解的异族，“因此他们坚信希腊人始终会同自己作对。”³但是这种嫌隙最初产生的原因何在，对希罗多德来讲仍然是个谜。也许这可以怪罪到当初绑架索赎一两个公主的希腊海盗头上，或者焚毁特洛伊城的战火？“至少这是亚洲许多民族不断争论的话题——但是谁又能肯定地说自己是正确的呢？”⁴正如希罗多德所了解的那样，世界如此之大，对一个人来说是真理的事情对另一个人可能是谎言。因此，即使东西方冲突的起源似乎已经迷失在神话之中，但它的影响却并没有消减。这些观点直到最近还被不幸地加以明证。差异滋生疑虑——疑虑导致战争。

的确，公元前 480 年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入侵希腊的战争是史无前例的，这场战争正好发生在希罗多德开始写作之前三十年。这种军事冒险是波斯人长久以来的一种特殊性。几十年以来的胜利——迅速而壮阔的胜利——成为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其战无不胜的神话反映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征服范围和速度。从前，他们只是生活在现在伊朗南部边区的平原和山地上的无名部落。而后来，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部落横扫整个中东地区，灭旧国，臣大邑，建立起一个东邻印度、西抵爱琴海岸的庞大帝国。经过这一系列的征服活动，薛西斯成了当时世界上权势最为强大的统治者。对他而言，能够动用的资源似乎无穷无尽以至于令人感到麻木不仁。直到 1944 年夏天盟军在欧洲登陆那天为止，欧洲都未曾经历过能够和这次入侵相匹敌的战事。

与这种空前的毁灭者相比，希腊则显得国小民寡，而且众邦林立。希腊这个称谓仅仅是一种地理概念的表述：它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一系列争论不休且常常盲目自大的城邦拼凑起来的。的确，希腊人认为他们是由语言、宗教和习俗结合起来的一个民族；但是看起来这些不同城市之间最大的共同风俗就是热衷于彼此攻伐。

波斯人在崛起的早期过程中看到了，征服那些生活在今天的土耳其西部地区的希腊人易如反掌——包括希罗多德的故乡——将这些地区纳入帝国领土。甚至连希腊本土的两个主要势力：民主初萌的雅典和严苛的军事国家斯巴达，两者都看似装备低劣，难以有效作战。波斯国王既然下定决心要一劳永逸地使这些生活在他庞大帝国西部边陲的蛮夷小族接受安抚，这一切的结局貌似已经注定。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面对这支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远征军，希腊本土却成功地抵挡了进攻。侵略者被赶了回去，希腊保持了自由。凭借一己之力抵抗强权并将其击退的传奇对希腊人来说一直是最为不同寻常的故事。他们如何成功做到这点？又为何能够如此？起初，又是什么原因致使这场针对他们的侵略战争被发动起来呢？像这一类的问题即使在四十年之后也并不缺乏紧迫性，它们促使希罗多德完整地运用小说体裁对这一段历史进行研究。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位编年史家全身心地、投入地追问这次冲突的起因，而并不将之归结为一个遥远过去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也不将之解释为某些神祇的心血来潮或智慧，也不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而是将它解说成为一些能够亲自检验的道理。通过转述幸存的知情者和见证人的叙说得以完成此书，希罗多德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人类学家、第一位研究性的报告人、第一位驻外通讯记者。⁵他称自己所从事的事情为“询问”——这是“历史”一词的最初含义。“我在此记录下这些内容，”他在人类第一部历史著作的开篇写下这样的句子，“目的在于保存有关过去的回忆，我的手段是记述希腊人与外邦人非凡的功绩——首先要说的是他们如何走向战争。”⁶

当然，历史学家常常喜欢讨论他们的材料的重大意义。以希罗多德为例，他的看法经历了两千五百年的考验。在这段时间里，这些看法所依靠的假设——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发生的大战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约翰·斯图尔特·米尔指出，“马拉松战役即使在英国历史中也仍然具有比黑斯廷(Hastings)战役更为重要的意义”。⁷黑格尔则用德国哲学家式的更为宏大的口吻声称“整个世界历史的关注点都在平衡中战栗。”⁸事实的确如此。

任何记载不屈反抗的传奇故事都令人热血沸腾——但是其紧张程度则取决于该传奇所达到的难以计算或不可比拟的高度。与薛西斯眼中的恐怖主义国家大杂烩所拥有的独立性相比，波斯人试图征服希腊本土的过程中，势如累卵的危机关头显然更为引人入胜。作为一个异国君主统治的对象，希腊人决不可能有机会发展它们独特的民主制度。培育希腊文明独特地位的许多因素也因此而不复存在。尔后，罗马帝国所继承的，并传衍至现代欧洲的重要遗产也将被不可限量地削弱。这不仅仅是西方世界失去了第一次为争取独立生存而进行的斗争的胜利，不幸的是，一旦希腊人在薛西斯的人侵中屈服，这个世界从此就不会再有“西方”这个实体了。

因此毫无疑问，波希战争的故事成为欧洲文明的神话之基石；是自由战胜奴役和淳朴的市民美德战胜衰弱的专制制度的完美典范。当然，在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世界”这个词汇已经失去了号召力，因此马拉松和萨拉米斯(Salamis)战场上的英雄气概开始打动众多的理想主义者，完全取代十字军成为西方人美德的光辉典范。更为重要的是，战争毕竟是抵抗而非侵略；为自由而战胜过为狂热而战。作为一个篇章，一小队希腊人在守卫温泉关(Thermopylae)小道的可怕战役——“四百勇士对抗三百万大军”，⁹正如希罗多德笔下所写的那样——表现出惊人的神奇力量。无数亚洲人部落被奴役并驱使到这里；而一位斯巴达国王勒奥尼达斯(Leonidas)决心非胜即死；他的三百同乡在战争中阵亡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勇气：“这个故事说明了一切。早在公元十六世纪，伟大的法国随笔作家米歇尔·德·蒙田就曾经说过，虽然希腊人进行的其他战斗都是“世上所有的最光辉的胜利，但是他们从来不敢将这些胜利荣耀的总和同勒奥尼达斯国王和他的战士们在温泉关进行的防御战所赢得的荣耀相提并论”。¹⁰两百五十年之后，拜伦勋爵惊闻当时希腊将要沦为土耳其苏丹治下的一个省份之时，他清楚地知道运用何样历史典故可以发出最为振聋发聩的战争号召。

大地！为了报答你的哺育

我们斯巴达人战死疆场！

百人余一，

仅仅为了坚守温泉关！¹¹

不仅如此，拜伦随后身体力行，效仿勒奥尼达斯的榜样为希腊自由之故光荣地战死疆场。拜伦之死所具有的魅力，现代第一例真正意义的名人之死，也仅仅增加了勒奥尼达斯的荣耀，更加有力地确立了温泉关战役的地位，使之在后世成为为自由而殉难的典范。小说家威廉·戈尔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访问这座关隘，尽管斯巴达这座城市自身是如此的“乏味和残酷”，他又为何觉得如此激动不安？

因为首先，这不仅因为人类精神会直接对一个关于牺牲和勇气的故事产生反应，就像酒杯会随着小提琴声发生共鸣一样。而且还因为在非常久远的历史长河中，这支队伍站在了历史线索最为恰当的地方。勒奥尼达斯所具有的意义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使我今天能够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也能写下任何我想说的话。他的贡献在于令我们拥有自由。¹²

换句话说，还有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冷静地反思，戈尔丁的赞美之词可能也会很好地为阿道夫·希特勒的煽动所用。对纳粹来说，温泉关这一段同样也是希腊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这一点也和蒙田一样。三百名守卫关隘的战士被希特勒认为是真正优秀种族的代表，这个种族为战争和崛起而生，根据元首更为异想天开的推想，甚至连斯巴达臭名昭著的肉汤也完全起源于日耳曼人居住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太因地区(Schleswig-Holstein)。1943年，当斯大林格勒战事正酣之时，希特勒明确地将德国第六集团军比作三百斯巴达勇士，但是后来，当他的将军投降之后，狂怒的希特勒说他的战士们的英勇行为“被一个平庸的懦夫一笔勾销”。¹³希特勒盛怒之下否定了一个勒奥尼达斯，纳粹德国的国防军也失去了一个将自

身重塑为新的温泉关的绝佳机会。

纳粹党同蒙田、拜伦和戈尔丁一样都能意识到与三百勇士相提并论的做法的确让人热血沸腾，这种比拟也暗示出仅仅将斯巴达人描写成自由的捍卫者也许有些以偏概全。通常情况下，事情的真相比神话更加复杂且令人着迷。假使薛西斯成功征服了希腊，占领斯巴达，这必将宣告这座骄傲城市的自由之终结——因为所有波斯国王的臣属都是他的奴仆。虽然奴役仍然能够使人保全性命：这种斯巴达人自己认为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对他们的邻人来讲却是一种宽容的庇佑。希特勒也非常明白斯巴达人的伟大之处是建立在对其邻邦无情地压迫之基础上，是对待“劣等民族”的范例，在纳粹入侵波兰并占领俄罗斯后残忍地效仿了这些做法。波斯的君王的精明之处在于，压迫其臣属之敌手当然可视为解放和保护这些斯巴达的邻国，这样充分显示出其帝国的慷慨与伟大。对于世代苦于斯巴达人统治之下的那些人来说，薛西斯的统治可能也会让他们觉得获得了自由。

重要的是，这里确实有一个塑造历史的悖论。在某种情况下，被一个外来强权所吞并也许会受到欢迎。如果按照希腊人所谴责的那样，薛西斯一定是一个暴君；而在古代伊拉克、阿卡德(Akkad)、亚述和巴比伦地区，千百年来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天下诸国，强者居之，这个伊朗人当然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统治权。伊拉克帝王的风范最为关键的要点始终是薄情寡义、铁腕统治。尽管波斯帝国也是在“攻城略地，铁骑铮铮，灭国无数”¹⁴ 的战斗中建立起来的，但是在它扩张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更为精明的应对挑战统治权的策略。通过保证忠诚的臣服者以安定并给予一些号令，向他们表现出公正而合理的驾驭与夺的技巧，波斯的国王代代相传，为他们及其子民打下了历史上最为辽阔的帝国。这确实是他们建立的丰功伟绩，为后来的岁月展示了建立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世界帝国的可能性。故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的榜样力量的影响也一定应当比特殊而转瞬即逝的雅典民主社会要长久得多。波斯诸王所建立的政治模型启发了后来的一个又一个帝国，即使进入了穆斯林时

代：自称为世界主宰的哈里发们正好是这种回应，虽然在伊斯兰的成语中有“自负如薛西斯”这样的说法。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古代波斯王权所建立的政治模型，在中东地区一直保留到 1922 年最后一位哈里发——土耳其苏丹——的统治被推翻^{*}为止。当然这就是奥萨马·本·拉登的最终目的：见证哈里发制度重新获得统治世界的特权。

当然古代波斯的影响，在同希腊比较的过程中常常是被间接、隐约地承认。1891 年，年轻的英国国会议员乔治·纳萨尼尔·寇松造访薛西斯的宫殿遗址，此地于温泉关战役一百五十年之后被亚历山大大帝报复性地焚毁，从此便被废弃于焦土之中。寇松勋爵用一种拜伦式的浪漫口吻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它充满了历史的严肃教训；它矗立在事物停止存在的篇章中；这些沉默的巨石发出了声音，向我们诉说着废墟难以言表的痛苦。”¹⁵七年之后，当时已经是凯德莱斯顿勋爵的寇松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因此，他也像莫卧儿皇室的继承人一样——这些人的高傲头衔并不被称为国王，而是波斯国王的总督——行使统治权利。英国的统治是由那些自觉的斯巴达式寄宿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人物进行管理的，但这种统治仍然被“东方自身所具有的环境和对令人神往的财富的夸耀”¹⁶彻底地感染——这样的特点最终来自于薛西斯宫殿那些消失了的断壁残垣中。它也许会令大英帝国将自己想象为雅典的继承者而感到满足；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同样受惠于雅典之死敌。

波斯就是波斯，换言之，希腊就是希腊——但有时候双方总会狭路相逢。他们在文明间的初次冲突中成为对立的双方，但是他们的影响跨越千年，余波至今未平，有时令东西方的对立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更加清晰。假使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中失败，他们的城邦将被毁灭，如此，则世界上将不会有柏拉图——而如果没有柏拉图，那么此人在后来的历史上各种神学流派中的影响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很难说还会有今日启发本·拉登的伊斯兰教。相对地，当布什

* 哈里发制度本身于两年后，即 1924 年被废除。

总统言称“邪恶轴心”之时，他这种将世界划分为彼此对立的光明和黑暗两部分的看法，最终是来自于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这位古代伊朗预言家的思想。虽然战胜薛西斯最终的确由希腊人做到了，同样这个胜利也是给所有欧洲人认识了自身的特点，但是波斯和希腊对历史的影响难以仅仅局限在东方和西方这样狭隘的概念中。一神教以及普世国家的看法，民主和极权主义的观念：这些都可以追根溯源到波希战争的时代。我们有理由将它描述为整个世界历史的一条主线。

然而，今天人们常常忽视这一段历史。彼得·格林在三十多年前出版的精彩作品《萨拉米斯岁月》（*The Year of Salamis*）是迄今为止最近的一部为大众读者写作的鸿篇巨制，作者那机智的写作风格令这个缺乏关注的题材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在习惯看法的影响下，人们常常将希腊人在波希战争中的胜利理解为欧洲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这种看法的鼓吹者虽然没有十分强调，假设事情不是如此的话，今日的欧洲可能就是穆斯林的天下，但人们仍然能够在字里行间体会到这一层意思），这种忽略似乎就更加不能理解了。¹⁷

或许格林没有到过近年来的鹿特丹或者马尔默；如今即使在雅典也可见清真寺和宣礼塔，而仅剩下欧盟首府始终没有穆斯林礼拜场所，这样的事实并不能减少他所表达出来的困惑感。如果有任何外在的力量的话。波希战争可能是一段古代历史，但是它也可以是二十世纪或者当代历史中未曾发生过的一段。

然而在格林所描述为不可理解的看法中，并不完全如此。虽然影响深远而且富有戏剧性，波希战争并不是一个容易拼凑起来的故事。有一点事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我们能够重新完整重现的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希罗多德告诉了我们有关此事的全部信息；可惜的是事情远不止如此。历史学家们可以试图从其他古典作家的故纸堆中寻章摘句，弥补一些空白之处；但是这种修补

工作需要极端的谨慎才可以进行。许多材料形成的时代距离这一事件几乎已经有成百上千年的间隔，虽然他们都声称要记述这个事件，但是其中相当多的并不是在“询问”，而是在写诗歌或者剧本。艾里斯·默多克在她的小说《美与善》中将希腊早期历史描绘成“对循规蹈矩之头脑提出的挑战。这是一项非常简单的游戏，而游戏者的技巧就在于将规则弄得复杂。”¹⁸那些很少看重小说的古风的希腊历史学者们喜欢引用这一段文字：为了他们致力于实现的任务，即利用那些少得可怜的证据片断来重现那消失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类似一个游戏。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在萨拉米斯这样的战役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所有解释都必须依靠这样的事实，而同时这些事实又处处都是漏洞：这看起来就像是要拼好一个坏了一半的魔方。无论如何研究、转动、重新组装，就是不可能把它拼成；永远不能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尽管萨拉米斯战役以其难以捉摸而闻名，但是表面上仍然充满了丰富的细节，让人觉得可以同斯巴达的早期历史相比较。一位著名的学者曾经直率地承认那个特殊的话题“是一道对最好的思想家的挑战性谜题”。¹⁹另一位则称其为必需的“智力体操”。²⁰还有一位更加干脆的直接将一本书的标题称为《斯巴达迷雾》。²¹

但是无论希腊历史的源头多么不完整，但总归是希腊人自己写作的。波斯人则例外，他们没有写下任何我们可以认定为有关真实事件的记录。尽管有帝国的官僚铭刻的石板保存下来，还有皇家公告镌刻在宫殿的墙壁上，当然还有这些辉煌的宫室自身的遗迹。然而，如果我们试图对波斯人和他们的帝国作任何思考的话，我们必须大量地依赖于他人的记叙。由于希腊人经常受到帝国军队的侵略、征服和掠夺——所以他们所记叙的内容并非为了敏锐而公允地描绘波斯人的性格及成就。但是希罗多德这样好学而阔达的人则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一位愤怒的爱国者用“Philobarbaros”——意思是“喜欢蛮族的人”的头衔来称呼他²²：这个词在古希腊人的口中相当于今天人们说的“自由派老好人”。但即使如此，在希罗多德写到言语不通的远方特殊民族之时，人们也不得不容忍他偶尔表现出来

的错误、偏见和时常想把波斯的早期历史看作神话故事的倾向。这些问题都是现代的历史学家所不敢贸然轻犯的错误。

面对挑战表现出来三种明显的反应。第一种就是表面上承认希腊人的偏见，将波斯人描绘为衰老而懦弱的人，不可思议地征服了世界。第二种则谴责希腊人所写的一切关于波斯的内容，将其视为宗族主义、欧洲中心论以及其他所有思想罪行的责任根源。第三种反应是最具有建设性的，考察希腊人对他们伟大的对手产生误解的程度，并通过这一点发现被扭曲了的真相：波斯人如何生活和看待他们的世界。一群令人敬佩的学者正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整个帝国被重新赋予了生命，被从历史的尘埃中拯救出来，为了表示对这一坚实的结果的敬意，一位历史学家写下了这样的话：“这是可以立足之处”。²³而如果比作一项发掘古墓的工作的话，其价值足堪与开启图坦卡蒙的陵墓相比肩。

但是，波斯人仍然被包裹在重重迷雾之中。也许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这里并没有黄金尸面罩令此项再发现生辉，仅有卷帙浩繁的著作和期刊。波斯学研究甚至比希腊学研究更为依赖于细致筛选可靠证据，深入分析材料和极端精致地衡量选择参考文献。在这个领域中，几乎每个细节都可能引起争论，某些话题——例如波斯诸王的宗教信仰——则好比最为变幻莫测的深渊，即使是目前闻名的最为卓越的学者在展望到冒险进入这些领域的时候都会感到棘手和心虚。

无知者无畏；但是即使如此，我希望努力沟通学院派和大众读者的这一尝试，看起来不会像薛西斯从亚洲向欧洲架设起那两英里长的浮桥一样充满虚荣心，并最终贻笑于希腊人。请读者们注意，本书叙述所赖以维系的那些细节依然是不确定和充满争议的——而文中草率之处一定如同垃圾堆上盘旋的苍蝇一样多不胜数，我在尾注中也提出了对此特点的总体意见。然而在承认我们难以准确复原一个遥远年代这一事实的同时，比这种无知更令我们震惊的或许是：我们竟然可以完成这样的尝试。我在这本书中寻求证明某种东西而不仅仅是叙述它，这是我的野心，想要沿着希罗多德的脚步

继续走下去——描绘出整个世界——包括东方和西方——陷入战争的全景画面。读者在被带到希腊之前会先被带回到亚述、波斯和巴比伦；在谈到斯巴达军国主义和雅典民主制度之前先要看到第一个统治世界的王权的兴起；到了全书的中部才会开始对波希战争自身的阐述。传统叙事中从一方开始谈起的方式现在可以被忽略了，尽管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是含混不清，但是我希望有充足的理由尝试将众多散落晦涩的证据片断拼接起来，对这场战争如何发生，有何人参加等问题形成新的阐释。这毕竟是一部同古代文学中任何其他作品一样有力而杰出的史诗；不论有多少无法说明的地方，它不是一部神话，而恰恰是历史的一部分。